

【区域经济理论】

“错位发展、串珠成链”：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

董雪兵 饶美仙 王杰

摘要：县域是国家经济安全压舱石、共同富裕着力点、发展特色产业的落脚点、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点。当前，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县域经济却被禁锢于要素割裂与同质化竞争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错位发展、串珠成链”的科学方法论，是新时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理论，旨在揭示动态比较优势持续升级的演化进程：首先，基于机会成本评估的差异化定位，实现县域经济动态比较优势的发现；其次，通过嵌入区域价值链，实现县域经济动态比较优势的升级；最后，在涌现出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通过知识耦合与协同创新，实现县域经济动态比较优势的创造。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为理解超大经济体内部的次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并将研究的基本单位从孤立的“县”推进到作为集体效率来源的“县域网络”，旨在推动县域经济实现从“单打独斗”到“集群作战”、从“点状突破”到“链式跃升”的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县域经济；动态比较优势；区域价值链；交易成本；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6-0027-10 **收稿日期：**2025-08-11

***基金项目：**202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区域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2025JZDZ005)；

2025年度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委托课题“中国区域经济学手册”(25BWT25)。

作者简介：董雪兵，男，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区域发展实验室主任，教授(杭州 310058)。

饶美仙，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博士后，通信作者(杭州 310058)。

王杰，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西安 71000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这为加快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县域兴，则市域活，则省域富，则国家强。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单元，是乡村全面振兴主战场与城乡融合关键载体(周密等，

2025)。县域经济既承载地方经济基础性内容，更是国家经济安全压舱石、共同富裕着力点、发展特色产业的落脚点、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点(孙久文等，202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壮大县域经济”；2025年地方两会上“县域经济”成为高频关键词。实践层面上，2024年我国县域GDP达50万亿元，占全国总量超40%，近3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聚于县域产业集群。可以看到,县域经济已成为从“城乡过渡带”到“战略支点”的超级引擎。县域经济以县城为核心、乡镇为枢纽、农村为腹地,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区域经济中“最小公倍数”的直观呈现,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优场域(贾晋等,2025)。然而,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以下困境:区域发展不均衡,两极分化加剧;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痼疾难以根治(郑有贵,2025);产业特色不彰,同质化内卷严重,加剧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技术要素辐射范围和深度不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周德等,2023);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县城市民化存在梗阻。县域发展的现实困境折射出新的理论问题,以“资本驱动和同质化追赶”为特征的传统发展范式,在新的发展阶段是否已经系统性失灵?当市场力量自发地倾向于集聚与极化时,那些处于外围、原子化的县域经济体,该如何通过主动的、超越行政边界的协同行为,重塑自身的增长路径?引领县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其内在的经济学逻辑又该如何构建?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学界围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展开丰富讨论。在功能定位层面,从增长极理论视角看,县域经济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中心—节点—网络”的层级架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合理分工与空间协同优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交织下的空间经济组织模式。从核心—边缘理论视角看,在县域经济体系中,“核心区”县城是县域经济的大脑,“边缘区”小城镇是生产基地或生态屏障。县域交通网、物流网降低城乡要素二元流动成本,削弱地理距离对经济联系的阻碍,推动县城—小城镇组成的核心—边缘结构从二元分割向功能互补转变。在空间组织层面,有学者基于空间重构视角,认为需突破孤立发展思维,以“空间一体化治理”为前提,通过资源渗透、产业交互和空间重塑等破解传统路径依赖(张瑞芳等,2024;陈卫强等,2025),或主张县域发展的“空间正义”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衍生的非均衡性(孔祥利等,2025)。基于协同发展视角,有研究认为需通过内生资源禀赋、外生政策/市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统合与价值共创等多维动力驱动(褚庆宜等,2023;谢昕莹等,2025),或通过“东西部协作”“反向飞地”

“山海协作”等产业链协同促进县域高质量发展(董雪兵等,2022;单德朋等,2025)。在发展动力层面,有学者基于创新驱动视角,认为基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市场化等要素赋能,或构建产学研用融通的县域创新生态可驱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王振华等,2024;董旭等,2024)。基于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的嵌套式协同视角,有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县域政策存在“目标—功能”“趋同一异化”及“能力—矛盾”方面适配性不强问题,并检验了财政金融协同政策、“资本市场县域工程”政策、合作社规范化政策等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李燕凌等,2022;张翔等,2025;周力等,2025)。可以看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呈现理论多元化、实践在地化、政策精细化三重趋势,但对于县域经济的差异化协同、功能共生等研究仍待深化;缺乏一个能够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跨区域的交易成本、网络形成的外部性以及区域治理结构的创新等核心经济学要素,整合于一体的分析框架,用以系统解释在强大的行政区划约束和地方竞争激励下,多个异质性的县域如何能够演化出一个超越地理邻近、旨在实现集体效率的区域协同网络。

面对上述理论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洞察县域发展实际“堵点”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错位发展、串珠成链”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科学方法论。要求各县域立足差异与比较优势,以本地资源禀赋为基础,科学研判自身功能定位与主攻方向,从而精准施策、扬长补短、攻克难题、塑造新优势,以破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县域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植于比较优势的科学理论,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发展的实践经验,为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促进县域经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最终为实现县域整体功能跃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错位发展、串珠成链”不仅是具体的策略组合,更蕴含了一套完整的、可被理论化的发展范式。在深刻理解“错位发展、串珠成链”县域高质量发展科学方法论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理论,用以识别县域高质量发展演进的一般机制。首先,通过差异化定位,以专业化分工发现县域的动态比较优势;其次,通过网络化整合,以构建区域性价值网络升级县域的动态比较

优势;最后,通过生态化涌现,以催生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创造县域的动态比较优势。为系统阐述并验证该理论机制,本文的研究路径安排如下:一是在理论构建层面,详细拆解分析框架的理论内核与驱动机制;二是在治理原则层面,辩证分析“错位发展”所追求的专业化分工与“串珠成链”所依赖的网络化整合在县域治理层面的内在张力与战略平衡;三是在实践路径层面,基于上述理论与原则,提出因地制宜与情景化的政策行动纲领。本文旨在推动县域经济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从孤立的“县”,转向作为集体效率来源的“县域网络”,为理解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二、基于动态比较优势演进的县域协同发展理论

立足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同质化竞争和市场分割困境,基于“错位发展、串珠成链”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本文尝试构建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理论。该理论旨在系统性阐释,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背景下,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县域经济,其动态比较优势是如何在“差异化定位—网络化整合—生态化涌现”的共同演进中,实现帕累托改进和可持续发展。在县域经济这一特定空间尺度上,通过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网络经济学及新经济地理学中关于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思想的整合和深化,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在差异中求协同、在协同中显差异”的分析框架。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理论的内涵可以通过一个内核、三大机制进行系统性阐释。

(一)理论内核

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理论的内核,在于揭示县域经济协同发展并非一个线性的单向流程,而是以动态比较优势持续升级为主线的三阶段动态演进逻辑,阐释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各县对机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最小化和网络外部性最大化的多重追求,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超越行政边界、具备系统韧性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在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理论中,“差异化定位”

是逻辑的起点,各县基于对机会成本的评估,在区域网络中发现并确立各自初始的、参与分工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初始优势的价值释放与升级,高度依赖于网络化整合。通过构建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区域价值链,县域得以嵌入一个更广阔的协同体系,并利用价值链提供的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促使其初始的、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向基于技术、工艺与市场知识的、更具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转化。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与功能的复杂化,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得以涌现。在此阶段,比较优势的来源发生根本性转变,系统具备了内生性地创造全新比较优势的能力,完成从优势追随到优势引领的跃迁。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差异化”解决同质低效问题,通过“链群”解决要素割裂问题,通过“共生”解决发展失衡问题,最终在县域内部形成产业互补、城乡融合、主体协同的生态系统,在县域之间形成分工有序、要素畅通、整体增值、韧性提升的区域共生网络。

(二)驱动机制

1. 差异化定位:专业化选择与动态比较优势发现

“错位发展”是县域经济从同质化竞争走向协同发展的逻辑起点,其本质是区域内部基于动态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定位和专业化分工的理性选择。过去,在分权模式“财政承包制”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竞争激励下(王瑞民等,2016;周黎安,2004),部分县域在发展实践中,受“唯GDP论”和“土地财政”等因素影响,倾向于采取一种资本驱动的赶超模式,其表现为对成熟工业模式的简单复制和“小而全”的产业布局。“趋同竞争”对单个县域而言在短期内是理性的,但在区域整体层面却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已无法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因此,推动县域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错位发展”是县域发展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推动范式转变的核心战略,其理论基石是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指出,实现区域发展效益最大化策略在于将资源配置集中于具备相对效率优势和较低机会成本的领域。这意味着“错位发展”的本质并非简单地立足于静态的资源禀赋差异,而是对县域机会成本的动态识别与精准把握,通过专业化分工,将资源配置于机会成本最低的领域,从而

实现区域间的帕累托改进。在此框架下,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县域发展的分化现象。例如,部分资源富集县之所以陷入“资源诅咒”,在于初级资源开发的超额利润扭曲了区域的机会成本结构,对初级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生产要素的“挤出效应”,即资本和劳动力过度集中于资源采掘业,使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现代服务业的机会成本被人为地推高,从而陷入了低附加值产业路径锁定。反之,许多成功县域的实践表明,其核心竞争力恰恰建立在精准选择了机会成本最低的特色产业之上,如利用人力资本优势发展电商、利用生态优势发展文旅等。当前,随着中心城市要素成本攀升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县域在生态产品、文化体验、特色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机会成本正相对下降,这为基于比较优势的“错位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县域的比较优势具有阶段性,技术更替、市场波动与发展跃迁将导致原有优势衰减,同时催生新的发展机遇。若缺乏发展眼光,“错位发展”将会沦为静态的“差异化标签”,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若缺乏创新思维,则会陷入“为错位而错位”的形式主义。当前,我国县域正迎来重塑比较优势的关键窗口期。一方面,中心城市在特定领域的机会成本正急剧攀升。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化,中心城市在土地、劳动力、环境容量等方面“硬约束”日益趋紧,导致其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系统性抬升。更重要的是,其在提供生态产品、文化体验、康养空间等非物质性产品方面的机会成本已变得极为高昂。另一方面,县域发展的机会成本正相对下降。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全国性的高速交通网络与现代物流体系,极大地降低了县域产品与服务融入全国市场的空间交易成本;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则有效弥补了县域在信息获取与市场对接上的传统短板;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则在不断削减跨区域生产与交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中心城市机会成本的“推力”与县域机会成本“拉力”所形成的“剪刀差”,为县域在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数字游民经济、特色手工业等领域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深刻理解这一机遇的经济学逻辑,是推动县域发展从被动政策承接到主动战略布局的前提。

历史机遇的把握,仍需依赖县域层面的能动战略与制度创新。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强调,区

域在动态竞争中可通过技术创新和经验积累突破要素禀赋决定论框架,将静态优势转化为持续竞争力。因此,“错位发展”需要秉持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思维,突破对现有资源禀赋的依赖,前瞻布局发展潜能与优先领域,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区域协同态势及乡村振兴诉求,着力构建“差异化—专业化—创新化”的动态竞争优势体系,从根本上破除产业发展同质化桎梏。“错位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依托分工差异将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价值,例如,农业主导县聚焦构建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工业优势县着力嵌入区域产业链价值链;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周边县域聚焦融入城市圈,构建专业化承接服务网络(郝思斯,2025)。各县域应立足于发挥比较优势、突出特色、找准方向,合理利用资源禀赋,扶持壮大现有资源,打造品牌特色产业集群,走以三产融合发展为依托、产业链延伸和附加值提升为手段、产品竞争力提高为目标的特色产业发展道路(张学良等,2023)。

通过县域间功能协同与县域内部空间重构(如城乡产业分区优化),培育差异化、特色化的县域经济体系,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错位发展”作为区域经济规律的战略实践,可驱动县域经济由规模导向转向量质跃升。该模式依托本要素禀赋、产业基底与发展潜能,以特色化筑牢竞争壁垒、以协同化增强比较优势、以韧性化防控系统风险。通过“错位发展”可高效破解低水平重复与系统性弱势难题,释放比较优势聚合效应,精准催化政策的靶向效能,开辟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路径。

2. 网络化整合:价值链嵌入与动态比较优势升级

“错位发展”为各县找准了初始比较优势,但受制于县域自身体量小、资源分散以及要素禀赋上呈现空间碎片化等特征,单一产业难以达到实现规模经济的最小有效规模,从而陷入“小而散”的发展陷阱与市场边缘化风险(张蔚文,2025)。此外,市场交易并非免费,原子化的县域在寻求跨区域合作时,必须独自承担巨大的搜寻、谈判与执行成本。这些无形的交易壁垒常常会完全吞噬其微弱的比较优势。因此,“串珠成链”所驱动的网络化整合,是在不改变县域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县域经济主体为了克服高昂交易成本、突破低端路径依赖,从而实现比较优势持续升级的关键组织创新。

“串珠成链”通过构建高效的网络治理结构,系统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比较优势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在地理邻近或产业紧密关联的网络内部,密集的信息交换与知识溢出,极大地降低了成员获取新技术、新市场机会的搜寻成本;长期的、重复的博弈关系促进了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形成,有效降低了逐次合作的谈判成本;区域性的声誉机制与非正式规范对机会主义行为构成了有力约束,也显著降低了跨区域合作的监督与执行成本。通过破除城乡要素自由双向流动壁垒,并产生扩散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城乡空间不断重构并走向融合发展。“串珠成链”将原本需要通过高成本市场交易才能获得的要素与服务,内化为网络内部低成本共享的“公共资源池”,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的运行效率,使各县域的专业化优势得以充分释放。

区域价值链为县域提供了产业升级的结构性渠道,这是驱动其比较优势从静态转向动态的核心机制。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出,嵌入价值链的企业可以通过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这四种核心路径实现产业升级。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县域这一特殊空间尺度,同样地,一个初始仅能承担低附加值生产环节的县域,通过与链条上掌握核心技术或市场渠道的“链主”企业及其他节点的紧密互动,能够获得知识溢出与学习机会。县域通过专注于价值链上机会成本最低的特定环节,如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从优化生产线到代工更加精密的产品,乃至设立区域性的研发中心或打造自主的区域品牌,从而实现从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最终的功能升级。这一产业升级的过程,本质上即是该县域的比较优势,从初始的、主要由低成本要素定义的形态,向由技术、工艺和组织能力定义的、更具持续性的内生性竞争优势的动态转化过程。

在县域比较优势持续升级的过程中,以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链群网络的形态与边界,显著降低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与运行成本,推动空间连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县域统筹,从而极大地加速了比较优势的升级过程。传统集聚理论高度强调物理空间上的邻近性,而数字技术则通过虚实融合的虚拟集聚,极大地拓展了集聚经济的空间边界,推动县域经济从“地理集中”走向“功能网络”(王如玉

等,2018)。数字平台与网络从根本上降低了远距离交易的成本。物流云平台、设计共享平台、供应链金融平台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将过去必须通过“面对面”才能实现的信任、协同与信息共享,转变为可以低成本、大规模、跨时空实现的“在线化”交互。这使得“串珠成链”不再受限于地理上的“串联”,转而可以构建起更为灵活、更具韧性的功能网络。江苏睢宁“沙集模式”的成功转型经验,就在于当地农户通过电商平台与物流网络,实现了与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直接对接,形成了一个以数据流为核心的“虚拟产业集群”,催生了“农户+网络+公司”的全新商业生态,最终实现了产业的规模化升级。

3. 生态化涌现:创新生态与动态比较优势创造

“差异化定位”精准识别出县域的比较优势,“网络化整合”驱动县域比较优势的升级,当县域间的网络化整合走向深化,一个超越产业协作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便会涌现。在此阶段,县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从升级已有的比较优势,跃迁至内生性地创造全新的比较优势,是区域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根本保障。

第一,县域内部的共生发展:从“分散割裂”到“系统协同”。

县域内部共生的本质,是克服传统“小而全”体系因要素与功能割裂所导致的高昂内部交易成本问题,通过差异化链群实现资源、主体、功能的有机整合。在产业间,需推动县域内部产业差异化互补,规避同质竞争,构建良性循环的内部产业生态系統。县域内部往往存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元产业共存的状态,但其发展模式容易陷入样样都搞、样样不精的困境。通过差异化链群共生模式,基于县域资源禀赋明确主导产业与配套产业的边界,并通过产业链将差异化产业进行串联,形成主导产业牵引、配套产业支撑的县域共生网络。如山区县可将生态农业作为主导产业,同时带动农产品初加工、乡村旅游、冷链支撑等配套产业发展,并通过配套产业反哺主导产业,从而使各产业均能在县域产业链群中占据合理生态位,既发挥比较优势,又相互依赖,避免内部恶性竞争。

在主体间,需推动县域多元主体功能共生,推动主体间从各自为战到利益共享转变。县域内部的核心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农民、社会组织等,其共生关系形成的关键是通过链群实现角色错位、功

能互补。在差异化链群共生模式下,政府主导差异化链群中产业布局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顶层设计,引导市场有序竞争;企业在差异化链群中承担产业链上下游的不同功能,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共生网络;而农民可以通过“共富工坊”“订单农业”“农村合作社”等模式嵌入区域产业链中,促进农民增收,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在城乡间,需畅通要素循环,消解“二元分割”实现城乡融合共生。县域内部的城乡差距本质是要素流动不畅,而差异化链群共生模式下,可通过功能分工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是以县城为核心枢纽承载城乡要素流动,通过小城镇节点连接城乡资源,形成协同发展网络的新型区域经济形态。该体系通过明确分工、加强协作,促进县域内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层次分明、功能协调的经济网络,打通要素双向流动梗阻,提升县域经济的整体效能和竞争力。县域内部通过高度协同、要素高效循环的系统性整合,为知识的本地化应用、新技术的快速采纳与商业模式的迭代创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地域根植性”基础,从而为创新生态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微观经济基础。

第二,县域之间的共生发展:从“同质竞争”到“串珠成链”。

县域之间的共生,致力于破解行政区经济壁垒所导致的区域市场分割与系统性资源错配问题。通过差异化定位与链群衔接形成跨区域共生网络,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具体而言,这种跨区域协同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在功能层面,通过一体化的链群规划,实现了各县域在区域价值链中分工的差异化锁定。由于相邻县域的资源禀赋雷同,县域经济发展容易陷入主导产业雷同、产业模式相似等产业同构现象,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与市场分割。而链群共生模式下,一体化的链群规划明确了各县域在区域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通过政府统筹协调与市场机制作用确保各县域“有所为有所不为”,形成“技术—生产—加工—市场”的专业化分工链条,避免县域间“小而散”的低效竞争,从而极大提升了区域整体的协同效能。

在要素层面,通过推动县域间要素流动的链群畅通,降低系统性交易成本提升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县域间跨行政区的壁垒往往导致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不畅,而链群共生则成为破解行政碎片化的“血管”。在差异化链群共生模式下,县域间通过生态位分工重塑要素流向,围绕链群共生的整体需求共建共享基础设施,消解信息不对称堵点,在链群中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进一步推动要素跨县域流动。

在效益层面,基于功能分工和要素共享的协同网络,实现县域间发展效益的“共生增值”,推动从个体帕累托最优向集体帕累托最优演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单个县域的经济增长,更是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而差异化链群通过“共生增值”实现这一目标。在差异化链群共生模式下,各县域在链群中成本共享、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在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的同时,也通过链群共生形成区域合力,实现“1+1>2”的共生增值效应。当跨区域的协同网络,从单纯的产业分工与要素交换,深化为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持续碰撞与重组的创新场域时,一个真正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涌现出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生性创造出的全新比较优势,将成为下一轮更高水平差异化定位的起点,从而驱动整个区域协同体系,开启新一轮比较优势的演化和升级。

三、“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辩证统一的理论意蕴

从理论机制的阐释走向现实政策的制定,需要从一般性规律的揭示,转向对具体情境下制度安排的设计与选择。差异化链群共生理论在县域有效应用的关键,在于对基于专业化分工的“错位发展”与基于网络化整合的“串珠成链”之间辩证关系的动态把握。过度追求分化优势,可能导致县域产业发展陷入“碎片化陷阱”;过度追求整合优势,也会引致区域发展因“锁定效应”而丧失创新活力。因此,在讨论具体的实践路径前,有必要将“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这对核心关系,从单纯的策略组合提升到战略层面进行辩证分析。这构成了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核心逻辑,也是其关键的政策意蕴所在。

“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体两翼,蕴含着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模式强调从复杂系统视角,重点关注县域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及各要素间的链接、耦合与协同发展。其中,“错位发展”强调需先把握全局方能精准定位自身角色;“串珠成链”则进一步要求实施统筹规划,以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两者既体现了差异化竞争的逻辑,又蕴含了协同整合的内涵。在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模式下,“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的战略要旨在于通过区域产业效能提升驱动居民收入增长,实现兴业、强县、富民目标的系统集成,从而解构县域同质化发展困境,推动城乡资源禀赋整合与协同进化。

(一)“错位发展”是“串珠成链”的基础条件

“错位发展”是价值链整合的逻辑基础,要求区域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精准锚定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产业方向及其特色定位,通过构筑区域异质性增长框架,为产业空间协同网络的形成奠定功能互补基础。“错位发展”使各县域产业分别占据价值链上的独特位置,为产业链条上下游的协同串联提供必要条件。“错位发展”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串珠成链”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进阶手段。区域特色化、专业化产业禀赋的培育构成了空间价值链建构的必要条件;反之,县域产业同构化将引致要素配置效率损失与竞底效应,不仅加剧区域协同的制度性摩擦,更将引致增长极系统的结构性塌陷。

(二)“串珠成链”是“错位发展”的必然要求

单一的错位产业(“珠”)可能面临产业“小而散”、市场规模小、边际成本高、抗风险韧性低等问题。“错位发展”衍生出的这些结构性局限需通过空间组织化实现帕累托改进。“串珠成链”通过整合专业化、特色化要素集聚优势,驱动产业空间结构向高阶形态跃迁,促使区域竞争范式从碎片化比较优势转向系统空间的经济租金获取。“串珠成链”放大了“错位发展”的优势与价值,通过“成链”将单一节点的县域产业优势转化为全链条的系统竞争力。“串珠成链”通过降低区域交易成本与强化垂直专业化,驱动异质性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该过程将引致区域产业能级跃迁及经济效益提升,是区域经济从碎片化比较优势向空间集聚租金跃迁的核心路径,标志着“错位发展”向制度互补性高阶均衡的必然演进。

(三)“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有机统一

“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是局部与整体、竞争与协同、差异化分工与系统性整合的辩证统一,是实现区域经济高效、协同、可持续发展的一体两面。“错位发展”是“分”,解决县域如何立足自身生存的问题;“串珠成链”是“合”,解决县域如何融入系统发展的问题。“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统一的目标是实现区域整体发展最优,核心是实现协同共生,具体表现为形成各展所长、各得其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区域生态体系。“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的制度性耦合,通过激活县域特色禀赋、释放产业规模效应,驱动县域发展范式实现从跟跑向领跑的跨越。在该协同架构中,“错位发展”构成价值链整合的先决条件,而“串珠成链”通过拓展制度互补空间,催化专业化深化与空间再域化,最终在超域尺度实现要素优化配置与协同效率提升,增强区域经济韧性并促进发展质量的结构性跃升。

(四)“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动态平衡

过度强调“错位发展”可能导致县域产业“小而散”“碎片化”,形成“产业孤岛”,难以发挥规模效应;过度追求“串珠成链”又可能忽视各节点产业的独特性,压制区域特色,导致“千县一面”与同质化内卷。需准确把握“错位发展”与“串珠成链”的辩证矛盾,根据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动态调整适配策略:在发展初期以“错位发展”为主,避免同质竞争的同时积累比较优势;在发展中期以“串珠成链”为主,形成区域竞争合力以融入更大的分工体系;在产业集群成熟后,通过技术创新、深化协同等催生新的差异化需求,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错位发展”。要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差异、市场驱动协同、制度保障平衡,准确把握“错位发展”的独特性与“串珠成链”的关联性之间的平衡,在差异中强化协同、在协同中深化差异,既让每个县域产业各美其美,又使整个跨区域产业链美美与共,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化与协同化的动态平衡,实现县域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提升的质变。

四、以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的规模经济、要素的合理利用、生态的永续发

展为标志,实质是县域经济由不均衡不全面发展向高效、集约、公平、均衡方向发展。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以差异化定位和产业链协同为核心,为破解县域发展困境提供了新路径。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运用系统观念,从整体上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特征,准确认识县域差异化链群共生蕴含的辩证关系,通过差异化定位激活比较优势,通过协同化整合提升整体效能,最终实现县域经济从“点状突破”到“链式跃升”的质变。

(一)精准锚定特色产业定位,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

立足县域全要素禀赋,以人无我有、人优我强为导向,以辩证思维剖析县域动态比较优势,着力打造县域特色产业基地。对于“显性优势”要实现对现有资源的纵向深耕和横向嫁接,如对县域传统优势资源进行产业链延伸、提升产业附加值,将已有资源与外部要素跨界融合,引入新产业形态。对于“隐性优势”可通过符号化重构与资产化运作激活沉睡资源,如将县域历史文化、生态资源等通过符号化、品牌化重构实现隐性资源价值向显性经济价值的转化,通过林业碳汇交易等产权交易、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化。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要强化数字化牵引,培育县域特色增长极,推广“一县一品一策”,通过都市圈要素导入、产业链精准卡位、数字化重构生产关系,实现“小县域与大网络”的深度咬合,避免“盆景式发展”。此外,从长远来看,还需要建立县域特色产业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识别县域动态比较优势,防止掉入路径依赖陷阱。可借助大数据手段,通过技术态势跟踪、消费趋势监测、政策智识与智定等实时捕捉产业变革信号,通过“制造”向“智造”的技术迭代、新兴产业跨界融合、细分市场精准切入等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坚持小步快跑、试错迭代,使县域特色产业在动态竞争中始终保持独特性、领先性、可持续性。

(二)推动县域经济嵌入都市圈经济,形成协同发展生态

都市圈经济具有高集聚性、强辐射性与创新驱动等特征,在集聚高端要素、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推进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要推动县域经济嵌入都市圈经济。一方面,县域要主动对接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产业规划,嵌入区域分工体系,以差异化定位激活比较优势,基于资源禀赋的生态位识

别,以系统观念构建县域特色产业生态位,在都市圈经济“链主—配套”“核心—节点”的生态位中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依托现有资源禀赋驱动县域产业空间重组,通过模块化网络治理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价值链位势跃迁、供应链鲁棒性强化及创新链适应性进化,并建构以“链主”企业为引领核心、多层次主体动态互补的产业生态系统。另一方面,要以都市圈功能优化延伸推动周边县域“融圈入群”“融圈入链”,优化都市圈与周边县域产业分工,锚定都市圈特色需求响应点,承接都市圈非核心但必需的生产环节;推动县域承接产业适配性升级,强化“都市圈—县域—城乡”的产业分工与有机联系;坚持输血帮扶和造血发展统一,推动周边县城产业链、价值链与利益链的优化重构与价值提升。最后,通过县域到都市圈、都市圈到县域的双向互动,推动形成“都市圈功能辐射—县域精准承接—二元双向融合—资源融合共享”的闭环,推动从“虹吸”到“反哺+辐射”的质变。

(三)构建县域微循环链,强化城乡融合纽带

一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弥合城乡要素二元缺口。通过政策引导、产业赋能、资源融合、市场推动等举措,打造“政策激励+平台支撑”的人才回流全周期服务体系;放宽乡村振兴领域的市场准入,科学引导城市资本入乡,探索农村不动产、生态资源等制度性转化通道和数字化产权体系,激活乡村资产变现。二是串联城乡产业协同链。在中心镇布局小微产业园,引导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山下乡”,形成“产业集聚—劳动力转型—城乡联动”的协同体系,打造“县城—中心镇—乡村”三级联动网络,推动城乡服务贯通。三是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创新“资源下沉—共建共享”的供给机制,建立“中心城市—县城—镇域—乡村”医疗联合体,分层分类推进医疗资源精准下沉,构建教育资源梯度共享体系,推动养老保险与城市梯度衔接;强化“需求导向—分类施策”的精准服务模式;对与中心城市接壤的县域加快推动同城化全面接轨,对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域通过“数字赋能+远程覆盖+特色补给”提升服务效能。四是创新城乡协同治理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城乡融合发展考核体系,强化以城带乡责任考核机制;推广“数字乡村大脑”经验,跨部门整合农业生产、环境等数据,推动基层智治的精准化、高效化和全民化。

(四)深化跨区域分工协作,构建开放型经济网络

跨区域协作将县域的“小特产”“小产业”嵌入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市场、大循环,打破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突破地理限制,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首先,整合县域资源向外探索“反向飞地经济”,推动欠发达县域向大城市“借势、借力、借脑、借生态”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浙江省已成功探索出消薄飞地、科创飞地、生态补偿飞地等“从低向高飞”的特色模式。聚焦县域低成本优势环节,推广产业链对促共富经验,通过形成“研发在飞地、生产在县域”“总部在飞地、基地在县域”等模式,带动中小企业形成跨区域产业集群,以飞地为枢纽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构建跨区域产业链协同体系、串联县域特色产业。其次,跨区域经济网络的高效协同发展,既需要交通、物流与信息等基础设施提供物理连通性基础支撑,也需要跨区域协作机制、统一大市场、营商环境优化等制度层面的协同保障。需强化基础设施联通,完善冷链物流、智慧仓储等设施,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深化数字技术赋能,建设县域产业互联网平台、跨区域产业大数据平台,推动“物理分散+数字集成”,促进跨域产能协作。最后,要对接国家战略,扩大开放合作,拓展内外需市场。例如,位于“一带一路”节点的县域可依托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综试区、海外仓等对接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产业,整合多县域特色产品,依托跨境产业链、跨境电商与国际产能合作等双向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

(五)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破解“低端锁定”

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有效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创新路径。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县域“错位发展、串珠成链”的一个关键方向是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科技革命持续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继起发展等机遇,从倚重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转向由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生态协同支撑的创新主导模式。以科技创新为支点撬动县域经济发展,一是要立足“小而特”“小而精”的发展定位,依托县域资源禀赋,因县制宜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避免盲目跟风高端产业,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挖掘特色优势资源潜力、培育本地化新质生产

力,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优势。二是要在提升产业链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完善县域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共建产业研究院、校地合作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的常态化合作,让更多创新资源为县域所用,让更多技术向县域转移、更多成果在县域转化。三是要强化县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县域产业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农业”“数字+牧业”“数字+商贸”等新业态,拓宽风电产业、碳汇经济、光伏农业等绿色应用场景,因地制宜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六)优化制度协同与利益共享,保障可持续发展

首先,构建跨部门跨层级政策协同机制,打破行政分割与市场壁垒,释放县域资源要素的乘数效应。完善“省级统筹—县域主责—乡镇协同”的三级政策传导机制,明确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清单与鼓励清单,避免县域间同质化竞争;允许基层在集体性经营、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开展创新探索,形成顶层定方向、基层闯经验的互动格局。其次,创新利益共享机制,破解各自为政困局。完善城乡产业融合、跨区域产业协同、城乡要素流动的收益分配、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制度,通过利益共享将有形之手、无形之手、自治之手有机结合,推动县域间竞争关系转化为共生关系,平衡多元主体利益,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必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市场应履行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功能,促进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另一方面,政府则需加强战略规划、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并着力消除区域间的制度性壁垒与体制性障碍。通过形成“市场越有效,政府越有为;政府越精准,市场越有力”的正向循环,弥补规模不经济、公共品短缺等短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 [1]周密,陈书鹏.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25(3).
- [2]孙久文,邢晓旭.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齐鲁学刊,2024(1).
- [3]贾晋,高远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困局、逻辑转置与未来进路[J].社会科学研究,2025(3).

- [4] 郑有贵.论城乡融合发展:对由城乡二元结构困扰向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转变的路径探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1).
- [5] 周德,钟文钰,张佳文,等.县域城乡融合评价及差异化发展路径:以浙江山区26县为例[J].地理科学,2023(10).
- [6] 张瑞芳,孙迎联.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趋向: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框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
- [7] 陈卫强,笪晓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推进路径:基于“资源—产业—空间”的系统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25(5).
- [8] 孔祥利,王艳.空间正义视域下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
- [9] 褚庆宜,赵祥云.县域统合: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政府行为逻辑:基于陕西省柞水县木耳产业发展经验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3(4).
- [10] 谢昕莹,王小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内生发展动力:框架构建、政策特征与提升路径:基于“目标—工具”视角的政策文本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
- [11] 董雪兵,孟顺杰,辛越优.“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5).
- [12] 单德朋,向洋,王超.东西部协作促进了受援县城乡融合发展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5(1).
- [13] 王振华,江金启.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J].经济经纬,2024(4).
- [14] 董旭,许高阳,薛桂芝.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吗?——来自中国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24(11).
- [15] 李燕凌,代蜜.我国县城城镇化政策的适配性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2).
- [16] 张翔,冉光和.财政金融协同如何驱动县域共同富裕:内生集约与外源竞合的研究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5).
- [17] 周力,羊洋,应瑞瑶.规范化政策对合作社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5(4).
- [18] 王瑞民,陶然,刘明兴.中国地方财政体制演变的逻辑与转型[J].国际经济评论,2016(2).
- [19]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
- [20] 郝思斯.错位发展 串珠成链[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5-06.
- [21] 张学良,周泽林,汤新云.推动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J].财贸研究,2023(6).
- [22] 张蔚文.畅通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J].人民论坛,2025(1).
- [23] 王如玉,梁琦,李广乾.虚拟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织新形态[J].管理世界,2018(2).

Dislocated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New Paradigm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Economies

Dong Xuebing Rao Meixian Wang Jie

Abstract: County-level economies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key areas for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primary venues for developing niche industries, and crucial hubs for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Currently, amid the ongoing deepen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hina's county-level economies remain confined within a pernicious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ed factor markets and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President Xi proposed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f “dislocated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which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ounty-level economies in the new era.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theory of differentiated chain-cluster symbiosis in county-level economies, unveiling the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sustained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upgrading. The theory posits that: (1) Strategic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opportunity cost assessment reveals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ounty-level economies; (2) Through embedding into regional value chains, County-level economies achiev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upgrading; (3) Within emergent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knowledge coupl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new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ounty-level economi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is paper developed a no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ub-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in super-large economies; (2) This paper shifted the unit of research from isolated counties to county networks as sources of collective efficiency, fundamentally transforming development from individual competition to collective action and from isolated breakthroughs to chain-based upgrading.

Key Words: County-Level Economie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gional Value Chains; Transaction Costs; Network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文 锐)